

“海丝”视角下： 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上）

□王荣国

摘要：隐元东渡实为兴福、崇福二寺的邀请，因崇福寺大檀越福清人列名邀请名单。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信仰的佛教，属禅宗又兼容海神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这是中国长江以南沿海普遍存在现象在长崎的再现，且与其海洋活动相关。隐元抵长崎弘法，将兴福、崇福等寺原先以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为中心的佛寺，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的禅宗丛林，华侨华人在“唐三寺”中信仰妈祖等活动仍然延续。反映了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

关键词：隐元禅师；长崎；华侨华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

隐元是明末清初中国禅宗临济宗著名禅师，将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重振的临济宗光大，同时也继密云、费隐重兴福清黄檗山之志，终使黄檗道场中兴，“黄檗宗风”再现，隐元禅师因之盛名远扬，影响深远。晚年应邀东渡扶桑传法长崎，且在京都建黄檗山万福禅寺弘法，开创日本黄檗宗。中外学界对此研究颇多，成果丰硕。隐元禅师在长崎弘法的社会基础是往返于“海丝”路上的华侨华人，这正是笔者关注的。本文拟以长崎华侨华人社会的佛教信仰为中心，考察隐元禅师的弘法。以下谨陈管见，祈请仁者指正。

一、隐元禅师东渡扶桑

隐元禅师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大振黄檗宗风，盛名远播扶桑。时任住持的逸然性融为使长崎兴福寺真正成为弘传佛法的道场，经德川幕府许可，致书福清黄檗山邀请隐元东渡弘法。隐元以“年老、途远”为由婉言辞谢。终因逸然性融的再三恳请，隐元禅师率徒冲破清军的阻挠抵达厦

门岛。据《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记载：南明永历八年“六月初三，至中左，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建国郑公暨诸勋镇络绎参谒，师以平等慈接之，各尽欢心而去。……廿一日，藩主备舟护送江头，别诸子有偈，即日启棹而东。”^①

可见，隐元一行于南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初三至“中左”。“中左”即“中左所”。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在厦门岛建城，移永宁卫中、左二所兵戍守，因称“中左所”^②。隐元至厦门寓“仙岩”^③，“藩主”郑成功送斋金供养。隐元住仙岩18天，其间，平等地慈接郑成功周围的上流人物如郑彩、许孚远和“诸勋镇”的参谒^④。二十一日，郑成功派人备舟并护送至江头，隐元禅师在此留下《中左江头别诸子》诗：“江头把臂泪沾衣，道义恩深难忍时。老叶苍黄飘格外，新英秀气发中枝。”^⑤可以印证。据杨国桢教授确认，江头是筲笕港的江头，今已淤塞^⑥。隐元一行乘坐的海船是郑成功拨派的，至于是兵船还是其属

下赴日贸易的商船，无从考证^⑦。

郑成功在《致隐元书信》中说：“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惟大师慧绍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遑帖回拜，谨即附闻”。^⑧

郑成功在信中谈及，“拨船护送”隐元禅师到日本，是因“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使法雨均沾，并表态对于隐元在黄檗山的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既反映了郑成功对隐元禅师敬重和感戴，也反映其信仰佛教之虔诚。

隐元一行在郑成功的帮助下顺利东渡扶桑，当年七月初五日（1654年8月16日）抵达日本长崎，开启了在扶桑的弘法历程^⑨。

二、日本华人华侨社会的佛教信仰

隐元禅师抵达日本时的华侨华人佛教信仰状况如何？是本论题所要涉及的。北宋时，我国就有商人从事海洋贸易而留居日本^⑩。日本的冲绳即明清时代的“琉球”。明朝前期琉球的中山、山南、山北三王国属中国朝贡国。其三王经常来华朝贡，朝廷赐闽人善于操舟的船工三十六户移居琉球，“以便贡使往来。”^⑪这些移居琉球的闽人聚居在琉球那霸的久米，其聚居点原称“唐营”，亦称“营中”，后改为“唐荣”。^⑫三十六户即三十六姓，都“善操舟”，其中，蔡崇是泉州府南安县人，郑义才、梁添是福州府长乐县人，林喜是福州府闽县林浦人，金英原系元末游闽山，居于闽省，红某

为闽人。从现存的“唐荣”诸姓家谱来看，这些人是明洪武或永乐年间由福建迁往琉球的^⑬。“以便贡使往来”是既为琉球使者开船又为其当翻译，为了完成明王朝与朝贡国琉球之间的外交使命而移居琉球。20世纪末，日本人真荣城安子女士到福建泉州寻根认祖时说，据家谱记载，她家本姓金，是明太祖时受赐到冲绳岛的福建沿海三十六姓之一^⑭。

明末清初，在“海丝”路上，我国从事海洋贸易东南、华南沿海的海商因前往日本长崎经商而留居长崎。长崎港是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时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但只许中国与荷兰的商船前来贸易。据西川如见的《长崎夜草话》记载，永禄五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装载瓷器、棉布、食品等货物的中国船只抵达长崎港口处的户町海岸^⑮。此后，我国沿海海商前往长崎从事贸易的人日增，不少人留居长崎经商。明末，福建漳州人颜思齐与泉州人郑芝龙海商集团长期在日本长崎经商。从后来率其同党分乘十三艘船从日本入居台湾看，当时其海商集团规模不小，人数相当多。当年在长崎经商的中国人人数可想而知，其中有经商定居日本长崎的^⑯。此外，明末清初一批明朝遗民如朱舜水、林北山等，因不愿做清廷的“奴才”东渡扶桑避难留居日本。

移居琉球、长崎等地华侨华人出于信仰需求在异邦兴建寺庙，从明末至清初在琉球、长崎的华侨华人社会中相继出现了一批寺庙。寺庙大致分为两类：

其一，以佛教为主的寺院。此类寺庙最早出于明代早期，明中后期至清代增多。琉球于明嘉靖朝前就建有圆觉寺、天界寺^⑰。宣德朝，柴山出使琉球途中遇险登岸后，在琉球南海岸建大安禅寺^⑱，继又建千佛灵阁^⑲，为琉球年代最古老的禅寺，但清人徐光祚于康熙朝末出使琉球时已“莫知其处”。他认为，护国寺“旧名安禅寺”，或许柴山所建。宣德朝后又陆续建有天王寺、临海寺等。这些寺院内有明朝官员的题匾以及铸的铜钟^⑳，属琉球

官方的大寺院。

据徐光祚的《中山传信录》记载：“久米，在那霸，有东门村、西门村、北门村、南门村，亦名大门村。旧有‘普门寺’，故又名普门地。皆洪武中赐闽人三十六姓居之，不他徙，故名‘唐营’，亦称‘营中’，后改为‘唐荣’。”^②引文中的“旧有‘普门寺’”应是一处清康熙朝已毁的普门寺，这原是一所奉祀观音的寺院。普门寺应属于“唐荣”四个村闽人三十六姓的佛寺。

在长崎，明代天启年间起，华侨华人相继兴建兴福寺、福济寺与崇福寺，其情况如下：

寺院名	地点	创建年代	说明
兴福寺	长崎东明山	天启三年 (1623)	江南、浙江、江西商帮船主发起并捐资创建。
福济寺	长崎分紫山	崇祯元年 (1628)	为福建漳泉帮船主倡议与集资创建。
崇福寺	长崎圣寿山	崇祯二年 (1629)	福建福州帮船主发起并捐资创建。

上述三寺合称“唐三寺”。兴福寺是江南^②、浙江、江西三江商帮创建的，福济寺与崇福寺都是福建帮创建的。显然，“唐三寺”的创建实际上是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在日本长崎经商的商人帮会的行为。由于创建者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从事海洋商业贸易，决定了这些寺院大都专门设有供奉海神妈祖殿堂：兴福寺，设有妈祖堂主祀妈祖，左右配祀关帝与大道公（三官大帝）；福济寺，设有青莲堂主祀妈祖，旁祀关帝和观音大士；崇福寺，设有妈祖堂主祀妈祖，旁祀三官大帝，在护法堂内祀关帝与观音^③。

据《长崎图志》记载：“崇福寺，在大光寺仑，名圣寿山，宽永九年（1629年），明人王（王引）、何（何高材）、林（林守殿）、魏（魏之琰）诸大商施。僧超然建，即祀天妃”。^④引文中的王、何、林、魏四姓护法都是在长崎经商的福唐（福清）人。

可见，上述寺院的共同之处是突出海神妈

祖与关帝信仰。以致日本学者内田直作教授说，“唐三寺”当初是以妈祖堂、关帝庙为主体的^⑤。这与寺院的兴造大都仰赖商帮、船主们捐资密不可分。事实上，自南宋以降，在我国东南、华南沿海及其岛屿的佛教寺院奉祀妈祖、关帝等神，或佛教僧人住持奉祀妈祖、关帝等宫庙的现象逐渐普遍。“唐三寺”上述现象只是我国沿海普遍存在的信仰现象在日本长崎的再现。

其二，以佛教为辅的庙宇。明初移居琉球的闽人在琉球创建庙宇。记载称“闽人移居中山（琉球）者创建庙祠，为同祈福”。^⑥其中主要是奉祀妈祖的庙宇。据记载：琉球天妃宫有二：一在那霸，曰“下天妃宫”……上天妃宫，在久米村。夏给谏子阳《使录》云：“此为嘉靖中册使郭给事汝霖所建。”他无碑记可证。宫在曲巷中，门南向，神堂东向。门旁，亦有石神二。进门，上甬道。左右宽数亩，缭垣周环。正为天妃神堂，右一楹为关帝神堂、左为僧寮。阶下，钟一所。大门左有神堂，上飨供龙神^⑦。

可见，徐光祚对“上天妃宫”为嘉靖朝郭汝霖创建提出质疑。前已述及，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聚居在那霸的久米。久米有东门、西门、北门、南门四个村落，其聚居点原称“唐营”，后改为“唐荣”。^⑧上文提及曾到福建泉州寻根认祖的真荣城安子女士说，其祖上本姓金，为明洪武年到琉球的福建沿海三十六姓之一，其先祖移居那霸久米村，创建天妃宫，崇拜妈祖。此庙目前还在，仍受崇拜。她一踏入泉州天妃殿，随即跪扑在地数分钟，激动得流泪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祖地，感到无比欢喜^⑨。从引文中的“上天妃宫”位于久米村判断，应是移居琉球国的闽人共同创建作为“祈福”的信仰场所。此“天妃宫”左侧建有“僧寮”，显然由僧人住持，这表明佛教对妈祖信仰的接纳。在长崎，日本方面将十善寺一带土地圈起建唐人屋敷（唐人坊），其周围筑坊墙，且有专人监管华商出入^⑩。华商、船主、水手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出坊，凡遇祭祀妈

祖日，长崎幕府准许出坊参加祭祀活动^④。唐人坊内最初建的神庙只有土地堂。乾隆元年（1736年），坊内建造天后堂，主祀天后圣母，附祀关帝和观音^⑤。乾隆二年又建独立的观音堂。应该说，无论是作为海神妈祖配祀的观音，还是独立奉祀在观音堂的观音，都属于民间化的佛教信仰。这虽然晚于隐元禅师在长崎弘法的年代，但所反映长崎华人华侨社会的信仰特点与隐元当时面对的原先以奉祀妈祖、关帝为中心的“唐三寺”则相差不大。（未完待续）

注释：

①《普照国师年谱》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第11卷，第5198页。《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简称《普照国师年谱》，下同。《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简称《隐元全集》。此为兰惠英所赠PDF格式电子书，博士研究生林友德帮忙收集部分研究论著PDF格式的电子书，谨此致谢。

②〔清〕周凯：《厦门志》卷二《分域略·沿革》，道光十九年刊本。

③④⑥⑦杨国桢：《隐元禅师与仙岩》《海涛集》，海洋出版社，2015年。仙岩即醉仙岩、天界寺，在厦门市万石植物园内；第12页；第13页；第13页；《隐元禅师与仙岩》《海涛集》第13页：“隐元乘坐的海船，既是郑成功拨派，带有护送使命，应该是郑军的兵船，至少是郑成功属下的赴日贸易商船”。

⑤《隐元禅师续录》《隐元全集》第3卷，第1501页。林观潮在《隐元隆琦禅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82页）说：“六月二十一日，隐元乘船东渡。面对送别而来的众多僧俗弟子，隐元在埠头吟出了以下一诗。中左江头别诸子，甲午六月廿有一日……尾联表明归国的约束，假定了一个‘碧天云净’的时期。从‘碧天云净’的假定可以推测，隐元东渡当日，中左所（厦门）应该是多云的天气。”笔者对其说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其一，诗中“道义恩深难忍时”之句用于指“送别而来的众多僧俗弟子”显然不对，通读全诗并无其意。“中左江头别诸子”中之“诸子”主要应指郑成功所派护送至江头者，其中有许孚远和“诸勋镇”。其二，“历史”是不能“假定”的，特别是后

一个对隐元出发当天天气“假定”是“多云”，更是站不脚的。从一个“假定”前提出发再推测一个“假定”，这就出现逻辑问题。至于“碧天云净是归期”的解释见后。另外，“甲午六月廿有一日”，原书中作“甲午六月念有一日”。

⑧郑成功：《致隐元书》，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编《郑成功文物史迹》，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9页。此为手迹影印件，原件现藏日本京都宇治市黄檗山万福禅寺。

⑨日本学界有观点认为，隐元禅师此行除了弘法，带有调查了解日本方面的情况，或为了谋求日本向南明派援军的可能性。隐元住摄津普门寺，日方对隐元实行警戒，对他与各方面的接触加以限制。杨国桢教授在《隐元禅师与仙岩》中说，这些信息，似和许孚远《送隐元赴日本》诗中所期许的“明年拟取黄图复，金叶飞来玉节通”，有前后呼应的关联。（《海涛集》第11—12页）基于此，笔者认为，隐元《中左江头别诸子》中“碧天云净是归期”诗句的“碧天云净”就寓有邦国安宁、海宇澄清之意。学界另一观点对隐元东渡，不持带有向日方求援军的目的。笔者认为，无论哪种说法都不否定隐元东渡弘法的基本史实，本文的撰写正基于此。

⑩《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七·日本国》（百衲本）：“咸平五年，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见之。”森克己《日本贸易研究》引《朝野群载》，转引自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⑪《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四·琉球》（百衲本）：“琉球居东南大海中，……洪武初，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帝喜，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有差。七年冬，泰期复来贡，并上皇太子笺。命刑部侍郎李浩赉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泰期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明年遣使贺正旦，贡马十六匹、硫磺千斤。又明年复贡。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使朝贡，礼赐如中山。十五年春，中山来贡，遣内官送其使还国。明年与山南王并来贡，诏赐二王镀金银印。时二王与山北王争雄，互相攻伐。命内史监丞梁民赐之敕，令罢兵息民，

三王并奉命。山北王怕尼芝即遣使偕二王使朝贡。十八年又贡，赐山北王鍍金银印如二王，而赐二王海舟各一。自是，三王屡遣使奉贡，中山王尤数。二十三年，中山来贡，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为门者所获，当入官。诏还之，仍赐以钞。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其冬，山南王亦遣从子及寨官子入国学，赐赉如之。自是，岁赐冬夏衣以为常。明年，中山两入贡，又遣寨官子肄业国学。是时，国法严，中山与山南生有非议诏书者。帝闻，置之死，而待其国如故。山北王怕尼芝已卒，其嗣王攀安知，二十九年春遣使来贡。令山南生肄业国学者归省，其冬复来。中山亦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鲁妹二人，先后来肄业，其感慕华风如此。中山又遣使请赐冠带，命礼部绘图，令自制。其王固以请，乃赐之，并赐其臣下冠服。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及惠帝嗣位，遣官以登极诏谕其国，三王亦奉贡不绝。”这里所谓“三十六户”即为“三十六姓”。

⑫〔清〕徐光葆：《中山传信录》卷第四。

⑬杨国桢：《唐荣诸姓宗族的整合与中华文化在琉球的流播》，《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1年，第119页。

⑭⑲黄炳元：《泉州—妈祖信仰传播的发祥地》，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1卷，第82-83页。

⑮郭梁：《长崎华侨史迹若干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⑯据估计，相当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4年），在长崎的中国人约4000多人。（转引自邵继通《长崎贸

易中的唐通事》《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0期）

⑰〔清〕陈侃：《使琉球录》《使事纪略》。丛书集成初编本。据说，琉球约于我国南宋后期出现佛寺。

⑱⑲萧崇业：《使琉球录》卷下《大安禅寺碑记》、《使琉球录》卷下《千佛灵阁碑记》。

⑳㉑㉒〔清〕徐光葆：《中山传信录》卷第四。

㉓江南省的前身即明代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即“江南承宣布政使司”，清康熙时，改为“江南省”，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以及湖北、江西与之相邻之地。表格所据资料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一书相关部分。

㉔童家洲：《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马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页。

㉕〔日〕宫田安：《长崎崇福寺论考》。长崎文献社，1975年出版，第18页。

㉖〔日〕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1949年，东京出版。

㉗阳球研究会编《阳球》第169页，转引自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㉘〔清〕徐光葆《中山传信录》《清代琉球资料纪录集辑、续辑》（合订本），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30页。

㉙㉚㉛〔日〕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第221页；第292页；第292页。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南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邮编：361000）

（责任编辑：志平）

English Abstracts of Key Articles

Several Mistakes of Fuzhou Chronicle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ts on the mistakes of the Fuzhou Chronicle, expounds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ndian—the capital of Min–Yue Kingdom, corrects the mistake of Gantang Port in Tang Dynasty by misannotating in Fu’an, demonstrates that Gantang Port was in Fuzhou, and Minhou (闽侯) is not Minhou (闽侯), and Ganyejing (泔液境) is not Ganyejing (甘液境), and Xianying Palace in Changle city makes offerings to Chen Yuanguang who was the founder of Zhangzhou Kingdom, and other historical problems.

Key words: Fuzhou Chronicle; the capital of Min–Yue Kingdom; Houguan; Gantang Port

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Checking and Proofreading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Chronicles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work of examining proofreading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chronicles, this paper makes a mor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proofread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ints for attention in revising the manuscript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exchanges with his colleagu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ilation quality of Chronicles.

Key words: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examination and proofreading; quality of Chronicles;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Points for Observation about “Silk Road of the Sea”: Zen Master Yinyuan Went to Japan to Spread Buddhism and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Nagasaki (the first part)

Abstract: Actually Zen Master Yinyuan was invited by Xingfu Temple and Chongfu Temple. As he was the Patron of Chongfu Temple and a native of Fuqing, he was listed on the invitation.

Buddhism, which is believed by overseas Chinese in Nagasaki, belongs to Zen Buddhism,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belief of the goddess Mazu and Guan Emperor. That is the common phenomenon along the China coastal area which i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mouth, but reappeared in Nagasaki. And it is related to its oceanic activities. Zen Master Yinyuan arrived at Nagasaki to spread the Dharma, transforming the Buddhist temple centered on the belief of Mazu, Emperor Guan and other gods into a Zen Buddhism. The activ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ethnic Chinese in the “three Monasteries of the Tang Dynasty,” such as Ma Zu, still continued. This reflects the respect for the diversity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Nagasaki. It also aim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Buddhist belief in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Zen Master Yinyuan; Nagasaki; overseas Chinese; Xingfu Temple; Chongfu Temple; Fuji Temple

The Policy of “Fujian Tea Revival”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ea Industry in Modern Fujian Province

Abstract: the rise of Fujian tea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Fujian tea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appeal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Fujian Tea Revival” as soon as possible. In 1935, because of the deepening of Fujian tea crisis, the Fujian National Government thought that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improving